

绪 论

一、研究背景

“文明若是自发地发展，而不是在自觉地发展，则留给自己的是荒漠。”这是马克思在 100 多年前对人类突飞猛进的工业文明发出的忠告。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的后 50 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破坏和污染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对生态文明的关注与反思。

1. 人类对自然环境影响的关注

人类通过生产劳动对自然环境产生影响，从早期的被动适应到后来的主动抗争，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冲突日益尖锐。尽管一些思想先驱者很早就提出了人类不合理利用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必将招致大自然报复的警告。但直到 20 世纪后期，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才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从总体上看，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是积极的，如通过垦殖和养殖活动把大量天然生态系统改变为农业生态系统，把可食用野生植物培育成农作物，把可役使、食用和观赏的野生动物驯化为饲养动物，满足了迅速增加的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而天然生态系统绝无此种可能；在长期的耕作中培育了性状和肥力都优于天然土壤的各种农业土壤，在这些土壤上生长的粮食、蔬菜、瓜果、花卉等保证了对人类需求的供给；人类对地表和近地表物质的机械搬运使地貌发生了变化，但这种改变为农业生产、采矿、水利和交通建设所必需；水利建设改变了地表水的时空分布，保证了航运和灌溉。遍布世界各国的水利工程则多有灌溉与防洪之利，中国京杭大运河、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是便利航运的典范。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上述每一项成就几乎都同时带来了负面影响。

例如农业开发必然破坏森林和草原；猎捕、毒杀、采集动物与人为改变其生活环境加速了物种灭绝；破坏原有地貌通常将导致地表稳定性减弱和侵蚀强度增加；不合理灌溉与耕作造成土壤次生盐渍化、改变土壤孔隙度和渗透能力、加剧土壤侵蚀和土地荒漠化；破坏水源涵养林引起突发性洪流、盲目抽取地下水导致区域性地下水位下降，河流上游超量用水导致下游断流；等等。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人类对大气圈与气候的影响，如化石燃料的燃烧使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急剧增加，造成氧平衡失调并可能波及地理环境中的生命过程；人为增加大气固体微粒含量改变了到达地表的太阳辐射量，导致气温变化；氟利昂物质的排放严重破坏了臭氧层。

2. 自然环境对人类不合理行为的反馈

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往往不是抑制，而是促进不利于人类本身的过程加速发展，反过来损害甚至毁灭人类文明。例如，20世纪物种的加速灭绝已使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达到空前的程度，灭绝物种竟在100万种以上。据估计，21世纪现有物种的1/3也将灭绝，几乎相当于过去数百万年正常灭绝物种的总和。而大多数物种的灭绝将对人类本身造成严重危害。驯养动物和栽培植物种数有限，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物种灭绝的总趋势。又如近200年来，全球森林面积至少减少了40%，寒、温带针叶林，热带、亚热带森林被大面积砍伐，开辟为永久性农田。草原也未能幸免，20世纪全球草原面积已减少近半。绿色植物的急剧减少破坏了大气氧平衡，已经和必将继续造成全球性生态灾难。滥垦、滥牧、过度樵采等掠夺性土地利用方式同样导致了水土流失加剧和部分地区的荒漠化。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环境遭到空前破坏和污染，相继出现“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生态学家指出，全球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

伍光和，等. 自然地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80.

伍光和，等. 自然地理学[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383.

3. 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反思

据世界银行统计, 19 世纪初全世界人口总数不过 10 亿, 20 世纪初为 16 亿, 20 世纪末已增到 60 亿, 2017 年已经达到了 75.3 亿。人口的爆炸性增长已经成为人地关系中首要的和最严峻的问题。与此相反, 由于全球土地面积的有限性, 各类农业用地的人均占有量已大幅下降, 耕地绝对量的增加也是以林地和草地的减少为代价的。尽管耕地扩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粮食生产仍有巨大潜力, 但全球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无疑会加剧。20 世纪 50 年代初, 全世界人均占有耕地 8.55 亩, 70 年代中期降为 5.85 亩, 90 年代初进一步减至 4.2 亩, 2000 年以来更是降至 3.75 亩, 耕地缺乏必然导致粮食不足。而我国以占全球 9.4% 的耕地养活着全球 22.2% 的人口, 人口与耕地的矛盾较世界大多数国家更为尖锐。人口迅速增长还导致人均占有淡水量逐渐减少。地球虽然拥有 13.7×10^8 千米³ 水量, 但淡水资源仅占其中的 3%。淡水的可利用性是 与全球水循环紧密联系在一起, 20 世纪全球淡水消耗量增长了数十倍。过量用水已导致河流水 量减少、断流, 湖泊缩小, 海水入侵河口段等一系列恶果。

能源与矿产趋于枯竭是又一全球性问题。1998 年 6 月 7 日, 美国《洛杉矶时报》发表的题为《即将来临的石油危机——真正的危机》的文章认为, 今后 10 年左右, 世界石油供应似乎是充足的。在今后 20 年左右的时间里, 全球石油产量可能开始持续下降。虽然市场力量和石油生产技术的改进可能使石油供应继续保持到 21 世纪, 但是石油危机的到来可能比一般人预想的早得多。地球上的石油到底还能供人类用多久?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专家认为地球上的石油仅够三四十 年, 有专家则认为可使用一两百年。以目前的生产水平衡量, 石油和天然气预计将在 21 世纪中期被开采殆尽。除铁和铝外, 其余所有主

封志明. 全球耕地资源变化态势及我国应采取的对策[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1994 (2): 69-73.

1 亩 \approx 666.66 米²。

封志明. 全球耕地资源变化态势及我国应采取的对策[J]. 国土与自然资源研究, 1994 (2): 69-73.

要金属矿产的保有储量都将下降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化石燃料的开采和使用，使得环境污染空前严重，新污染源和污染物不断增加，污染范围日益扩大。面对“比非典还可怕的雾霾”，我们再也不能束手无策地等待北风了，环境污染造成的后果已明显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严峻的现实让人类已经意识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在探索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经历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悲观与无奈、或然论的彷徨无定、人定胜天论的浮躁之后，我们看到曾经被称为落后典型的“自给自足”乡村经济与民族文化的勃发生机。以传统聚落生态智慧为代表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方式给了我们无限启示，其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有理由成为支撑人类持续、健康、和谐发展不可缺少的智慧。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地方性知识的重构

人如何栖居于大地上？我找不到自己在哪里？我是谁？这依然是未解决的问题。笛卡尔（Descartes）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确立了“我在”的依据是“我思”，却没有言说“我在”的存在方式。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成为空间与地方再组织与再生产的重要背景，大众传播、增强的移动力（如高速公路）以及消费社会成为加速世界同质化的三大力量。在全球化语境下，地方（Place）固有的社会与文化边界不断受到全球化力量的威胁，地方的意义被全球性要素所消解。哈维（Harvey）指出，全球化时代处在一个史无前例的“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之中，经济与文化力量超越了传统的空间限制，在一个更大尺度下对空间和地方的建构方式与组织形式进行着重构。地方侵蚀的议题也是拉尔夫（Relph）对“地方”

CRESSWELL T.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M]. Oxford: Blackwell, 2004: 73.

HARVEY D.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M]. Oxford: Brasil Blackwell, 1989. 260-283. 转引自朱斌，钱俊希，陈晓亮. 地方与认同：欧美人文地理学对地方的再认识[J]. 人文地理，2010，25（6）：1-6.

持续思考的根源。随着对全球化过程理性认识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全球化过程远非一个去地方化的过程，而是地方性在一个全新的关系体系中得到重新定义，并产生新的地方意义的新过程。一方面，全球化的过程在全球的分布是不均匀的，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区域，尤其是不发达区域来说，地方性的意义依然是建构社会关系更为重要的基础；另一方面，全球性力量对于地方性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地导致地方性消亡，而是在于对地方意义的重构。全球性力量的作用是深深扎根在地方化的形式中的。从本质上来说，全球化过程是全球性力量与地方性力量相互融合、共同作用的产物，而不是前者消灭后者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差异的内容得到重构，而基于地方的文化特质与社会关系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特征。因此，“地方”是一种观看、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P. Kotler、D. H. Haider & I. Rein 在“地方再造”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地方战(Place War)”的时代，一个地方同别的地方为经济生存而竞争。在地方理论的发展过程中，Heidegger 推崇“地方精神”(Genius Loci)，Harvey 倡导“场所感(Sense of Place)”，段义孚主张“地方(Place)”与“地方情结(Topophilia)”，MacCannell 指出现代化最后的胜利并不是一个非现代世界的现实，而在于它的人工保存与重建。因此，给我们的启示就是要时刻牢记地方精神原则：每一个地方都有其自然和文化的历史过程，两者相适应而形成了地方特色及地方含义，目的地要体现地方个性与差异，邹统钎称之为“地格”。一个地方如果没有地格就无法确认身份，地格的丧失就是地方文化主权的丧失，如果黄果树瀑布像尼亚加拉大瀑布，长江三峡像科罗拉多大峡谷，拉萨像上海，旅游业也就寿终正寝了。北京的四合院、永定的土楼、川西

RE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M]. London: Pion, 1976: 2-46.

MASSEY D. Power 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A]. BIRD J, CURTIS B, PUTMAN T, et al.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1993: 60-70.

WATTS M J. Mapping Meaning, Denoting difference, Imagining Identity: Dialectical Images and Postmodern Geographies[J].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1991, 73 (1): 7-16.

Cresswell T.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M]. Oxford: Blackwell, 2004: 21.

邹统钎，等. 旅游学术思想流派[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 2.

的碉楼、珠三角的蚝壳屋、湘西的吊脚楼，因为有差异才有美。Relph警告说：地方正在被摧毁，组织的力量与市场的渗透导致了非真实（Inauthentic）甚至是无地方（Placeless）。地方是斗争的目标，也是斗争的场所，只有有抵抗的斗争，才可以制造空间的独特性与差异性。

因此，从学术理论的角度来看，本研究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地方性知识的重构，各个地方的生态智慧即为地方性知识的重要内容，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包含的生态智慧，强调了地方生物与文化的多样性、整体性与和谐性，隐含着对生物多样性的欣赏和尊重，为说明地方性知识的产生根源及其合法性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实践意义：鉴往知来，启迪当下

本课题研究的传统聚落是指在历史时期形成、保留有明显的历史文化特征且历史风貌相对完整的村落，是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长期相互作用的结果。生态智慧指的是人与大自然和谐相融的智慧。研究的应用价值主要体现在：一是有助于丰富和扩展聚落地理学的研究内容。通过对传统聚落规划选址、民居建造、内部设计、社区营建、乡土材料运用等生态智慧的辨识和比较研究，丰富和扩展聚落形态和聚落类型研究的内容，为城乡规划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借鉴意义。二是有助于传统聚落文化挖掘和遗产保护。长期以来对传统聚落遗产价值和地方感的辨别，都因只能获取点滴知识未能成体系而变得模棱两可、含混不清，根本原因就是缺少对传统聚落“生态智慧元”的挖掘和整理。本项研究着重于传统聚落“生态智慧元”的挖掘和整理，并形成体系，开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三是有助于美丽乡村建设。通过对传统聚落生态智慧的挖掘和整理，可以探寻传统乡土文化建筑的内在基因，能为美丽乡村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可以创造出体现地域文化基因和传统文化特点又不失现代气息的城镇和村落。

三、研究综述

邹统钎，等. 旅游学术思想流派[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3，3-4.

为了对“生态智慧”研究领域有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本研究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为文献来源,以“生态智慧”为主题关键词进行多库全文检索,时间设定为2018年12月31日前,初步得到文献1286篇,去除一稿多发、通知、简介等无效文献,最终得到相关论文1220篇。结合SPSS、EXCEL软件对检索到的目标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对“生态智慧”研究方向的论文研究进程、著者及机构、文献来源和研究内容等主体方面进行统计分析,并且依据关键词统计方法分析当前我国“生态智慧”研究现状。

(一) 研究历程分析

通过文献检索,可以查到最早的一篇文献发表于1992年。进入21世纪以来,文献数量呈现指数增长趋势。基于文献量增长规律,拟合出年文献累积量指数增长模型: $y=4.956e^{0.183x}$,拟合系数 $R^2=0.8898$,基于目前数据建构的时间序列模型推断,未来关于生态智慧研究的增长趋势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指数型曲线一般是学科知识发展初期的特征,说明现在学术界对此的研究还处于起步发展阶段。依据“生态智慧”年度文献数量指标,可以将我国生态智慧的研究现状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萌芽阶段(1992年以前),该时期的特点是文献数量较少,可以查找到的最早的文献是余正荣等发表在《宁夏社会科学》上的一篇文章:《略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态智慧》,时间为1992年6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限于当时学术交流条件的限制,虽然CNKI中没有文献记录,但实际上有一些学者已开始了对这方面的关注。如笔者的大学老师在课堂上曾给我们介绍过湘西侗族“林粮间作”和“稻鱼鸭共生”的生态做法。第二阶段为缓慢发展阶段(1992—1998年),该阶段的主要工作是传统生态智慧哲学思想的解读、传统生态智慧实践做法分析、现代生态智慧哲学理论的引入和探讨,其主要特点是文献量增长缓慢。第三阶段为快速发展阶段(1998年以来),随着传统生态智慧哲学思想、现代生态理念与研究框架等的相对成熟,生态智慧研究受到众多研究者的青睐。因此,该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文献量迅速增长,生态智慧研究更为深入广泛(图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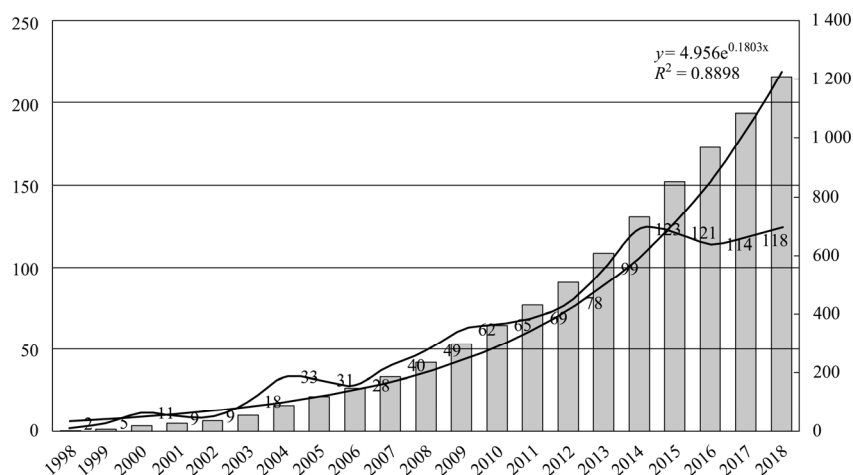


图 0-1 生态智慧研究文献年度数量增长情况

数据来源：CNKI

上述文献年度数量增长趋势与我国政府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行动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1992 年中央 9 号文发布《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发展中加以统筹考虑。1998 年实施的“一退三还”是环境政策的转折点。“十五”期间（2000—2005 年），党中央、国务院提出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21 世纪议程——中国 21 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从人口、环境与发展国情出发，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以及行动方案。“十二五”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环境质量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中增加了“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

（二）著者及研究机构分析

在文献计量学方法中，通常要通过寻找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来发现此领域的主要研究现状。根据美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普赖斯的理

论，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生产力及其对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可以通过出版作品的统计来探讨。普赖斯定律表示为：

$$M = 0.749(N_{\max})^{\frac{1}{2}}$$

其中， M 为核心作者至少应发文数， N 为统计年份内该领域发文数最多的作者所发篇数。因此，发文数不少于 M 的作者才能被称为核心作者。在以生态智慧为主题的 1220 篇文献中，作者包庆德发文量最多，为 11 篇，即 $N=11$ 。计算得到 M 取整为 3，满足第一作者发文量超过 3 篇的有 37 人，总共发文 161 篇，约占总篇数的 13.2%。普赖斯在其代表作《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曾有如下论述：“在同一主题中，半数的论文为一群高生产能力作者所撰，这一作者集合的数量上约等于全部作者总数的平方根。”如果从这个指标来看，我国生态智慧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需要挖掘和培养更多的学术带头人（图 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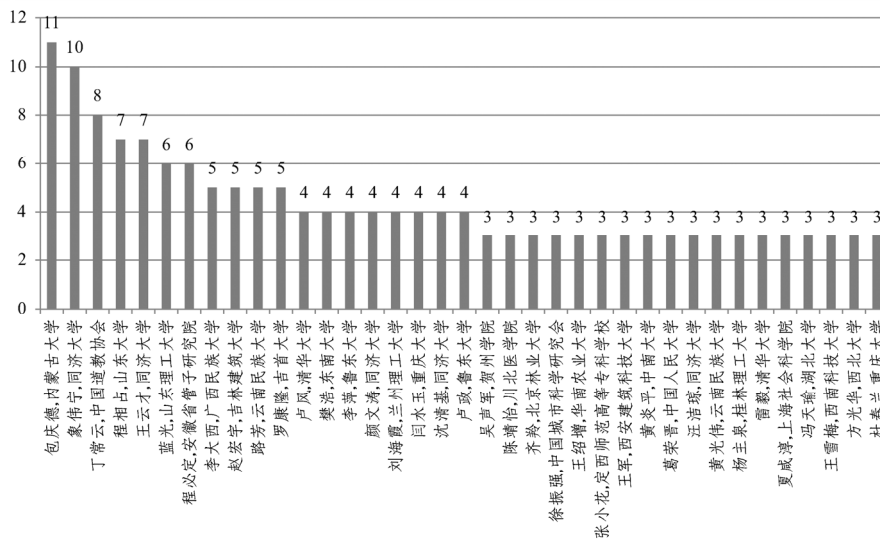


图 0-2 发文数量大于 3 篇（含）以上的作者群

数据来源：CNKI

通过对著者机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统计年度间,发文数量超过 8 篇的研究机构共有 28 个,这些研究机构均为高等院校,其中山东大学发文数量达到 34 篇,位列首位(表 0-1)。

表 0-1 生态智慧研究发文数量排在前 10 位的研究机构

序号	研究机构	文献量
1	山东大学	34
2	同济大学	27
3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19
4	重庆大学	15
5	武汉大学/苏州大学	14
6	吉首大学/清华大学/内蒙古大学	13
7	广西民族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山东理工大学	11
8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林业大学/曲阜师范大学	10
9	南京林业大学/河南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	9
10	山东建筑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南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合肥工业大学/东南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8

数据来源:CNKI

(三) 文献来源分析

根据布拉德福定律所述,若将大量期刊根据刊载某学科专业论文数量的多少由多到少排列,就可以将这些期刊分为专门针对这个学科的核心区、相关区以及非相关区。采用比利时情报学家埃格黑的布拉福德核心区数量计算方法对该学科核心区进行计算,即:

$$R = 2 \ln(e^E \cdot Y)$$

该式中, R 是核心数量, E 是欧拉系数且 $E=0.5772$, Y 为最多载文量期刊的载文量。根据此式,可计算生态智慧研究领域的核心区 $R=2 \ln(1.7810 \times 13) \approx 5$,根据这一指标可以得出结论:《风景园林》《中国园林》《生态学报》《中国宗教》《环境教育》这 5 种期刊处于生态智慧研究领域的核心区。除了以上 5 种核心区期刊外,还有很多在生态智慧

研究领域载文量较小的期刊(图 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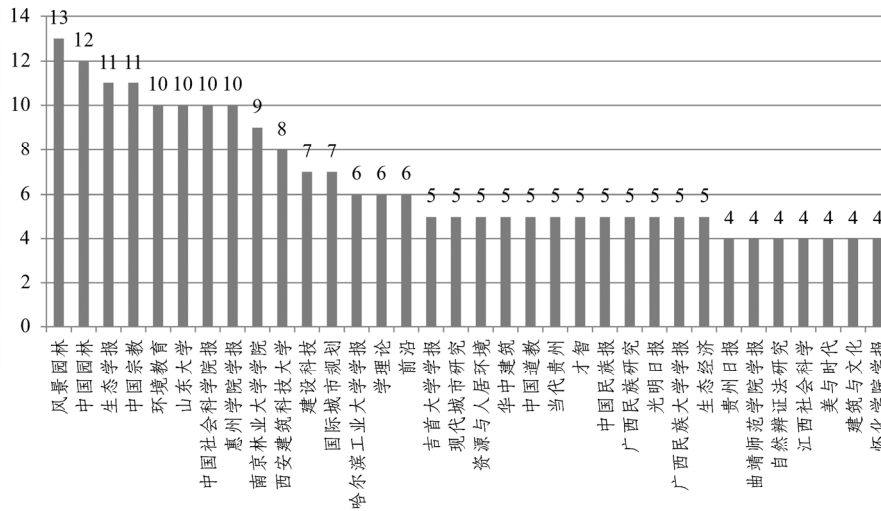


图 0-3 发文数量大于 4 篇(含)以上的文献来源群

数据来源: CNKI

对这些期刊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生态智慧所涉及的领域宽泛,已经受到经济、管理、文化、宗教、园林、建筑、地理、生态、哲学、教育、美学等多学科研究者的关注。但是,这些研究者主要从各自的学科背景对问题进行探究,缺乏对生态智慧的整体性梳理和系统性研究,对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关照不够,需要在学科融合的视角下与当下如火如荼开展的美丽乡村建设实践相结合。

(四) 主要研究内容分析

对检索结果中的 1220 篇文献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发现大致形成了以下几方面主要的研究内容:

一是生态智慧的溯源研究。该领域主要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如孔子对“天命”充满敬畏、“仁”心泽于鸟兽以及“任民爱物”生态思想探究。道教“天人合一”“道法

高伟洁. 孔子生态智慧探微——以《论语》为核心的考察[J]. 河南社会科学, 2017, 25(12): 120-124.

自然”生态思想的探究；墨家“上究天志，中稽古圣，下察民意”的天、地、人和谐理念的探究；王阳明“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生命关怀与生态智慧探究；中国古代游记中的环境伦理思想研究；张明对道家、儒家、佛家三家思想中蕴含的生态思想进行了归纳梳理等。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厚重、形式类型多样，常常使研究者有常谈常新的感觉。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阐述、迸发的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并不是出于关注生态环境的考虑，而是为了用这些生态理念来佐证其社会人伦思想。

二是生态智慧识别与生态行动。该领域研究成果同样丰富，且呈现出地域性、碎片化的特点，如在对瑶族生态智慧识别的时候，以及徐益棠、费孝通、杨成志等老一辈人类学者在南岭走廊的瑶族聚居地调查时，他们关注的重点是瑶族的社会组织、历史文化，但他们的调查报告也涉及瑶族的生态知识和生态行动，譬如我们在调查报告中读到瑶族传统聚落的水车、利用水力舂米、利用水池沉淀饮用水中的泥沙、用整条竹子做成各式引水管道等。自古以来，瑶族及其先民在生产力低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了“食过一山，又徙一山”的“游耕”生计方式，这种看似“落后”的生产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却正体现了瑶族人民朴素的生态智慧，也体现了瑶族及其先民在林木生产中形成的比较原始的生态伦理思想。安丰军 在分析瑶族林木生态伦理思

余卫国. 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价值和出场路径[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2): 45-47.

孙亦平. 论道教生态智慧的当代价值[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8(1): 21-26.

黄小珍. “尊道”在于“贵德”: 老子的生态伦理意蕴[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3): 20-28.

陈小刚. 墨家生态智慧及其当代价值[J].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 21(1): 87-91.

郭齐勇. 王阳明的生命关怀与生态智慧[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35(1): 134-140.

刘於清. 中国古代游记中的环境伦理思想研究[D]. 吉首: 吉首大学, 2016.

张明.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J]. 环境教育, 2011(10): 43-47.

安丰军. 瑶族林木生态伦理思想探析[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2011, 33(6): 107-111.

想时指出，这种取之有度的林木资源保护思想对解决目前人类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也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马军^①意识到了瑶族生态智慧对对抗、减少自然灾害和生物灾害的价值，他认为瑶族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知识与减灾理念对今天的生态危机缓解具有较强的启示作用。刘卫平等^②运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瑶族生态智慧进行考察，发现瑶族生态智慧具有整体性、系统性，内容包涵人地之间的关系、生产实践及信仰空间。在新时代，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瑶族生态智慧仍具有历史价值。上述对瑶族生态思想的研究虽然涉及瑶族的生态智慧，但缺乏对瑶族生态智慧的整体性梳理和系统性研究。此外，在生态智慧利用与行动方面，刘华斌等^③以对江西流坑传统村落的调查为例，系统分析了流坑在蓄水系统、排水设施、净水系统、调节气候、发展经济等方面的水生态智慧，为破解当下乡村水问题困境提供了若干启示。此外，以城市雨洪治理为突破口的实践问题导向型研究也逐渐增加^④。从各地的研究来看，各民族传统文化中蕴藏着大量防范生态危机的睿智做法，但是这些生态智慧研究碎片化明显，还没有形成一门系统科学。

三是国外生态思想的译介。该研究领域有两个关键词出现频率极高，分别是“深层生态学”和“人类中心主义”。纵观生态学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粗略地将之划分为生态学、深层生态学、深层生态运动三个阶段。认真思考会发现，这三个阶段的思想观念都隐含着生态智慧，并且越来越明显。国内学者重点介绍了阿伦·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斯宾诺莎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哲学思想以及蕴含于西方文化中的

① 马军. 瑶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知识与减灾[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 29(2): 32-35.

② 刘卫平, 陈敬胜. 瑶族生态智慧对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的价值启示[J]. 民族论坛, 2018(4): 86-90.

③ 刘华斌, 古新仁. 传统村落水生态智慧与实践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江西抚州流坑古村的启示[J]. 三峡生态环境监测, 2018, 3(4): 51-57.

④ 王绍增, 象伟宁, 刘之欣. 从生态智慧的视角探寻城市雨洪安全与利用的答案[J]. 生态学报, 2016, 36(16): 4921-4925; 陈利顶. 城市雨洪管控需要生态智慧的引领[J]. 生态学报, 2016, 36(16): 4932-4934; 颜文涛, 王云才, 象伟宁. 城市雨洪管理实践需要生态实践智慧的引导[J]. 生态学报, 2016, 36(16): 4926-4928.

王秀红. 阿伦·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D]. 武汉: 湖北大学, 2017.

万物平等思想等。其中阿伦·奈斯（Arne Naess，1912—2009）被誉为“深层生态学之父”，他是世界著名的哲学家。阿伦·奈斯创立并发展了“深层生态学”这一具有革命性的生态哲学理论，提出了“生态智慧T”，引领了深层生态运动，在学术界及西方环境运动中均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如果不研究深层生态学，对西方环境哲学和环境伦理学的认识就会有一个断层。不弄清奈斯的深层生态思想，就无法全面、深刻地理解深层生态学。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思想是人们反思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工具，他的整体主义的环境保护理念以及实践主张为环境保护提供了重要的思路与借鉴。生态中心主义平等是指地球生态系统的的所有存在物都有存在与繁殖后代的道德权利，力求在追求个体生存利益的过程中完成自我实现的转换。一方面，生态中心主义在基于对生态系统的的所有存在物认同的基础上，肯定所有存在物的生命价值以及内在价值，每一物种（包括所有个体）都有权利与潜力实现自我生命价值，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肯定生命的平等和对生命的尊重；另一方面，生态中心主义平等主张人类与非人类生命都具有获得道德关怀的资格，这是因为人类与非人类生命同属于生态系统的成员，都是大自然的一员。但是，由于西方深层生态学涵盖范围广阔，中国的译介研究还不能对其概貌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要么一味认同、要么全面质疑的争论表露了自身的文化焦虑。

四是“生态批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作为“生态学人文转向”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批评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和中国同时萌生并逐步向前推进。20余年来，中国生态批评在译介与研究西方生态批评理论、挖掘和阐释中国古代生态资源、进行生态文学评论实践、构建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理论形态等维度取得了较大进展，“边缘性的努力”已经显现出“思潮性的成果”。该研究领域的研究者大多具有跨学科研究的能力和潜质，如文艺学方

王英. 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何以可能[D]. 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09.

王秀红. 阿伦·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D]. 武汉：湖北大学，2017.

雷毅. 深层生态学：阐释与整合[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67.

马治军. 道在途中——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生成[D]. 苏州大学，2012：4.

面的跨学科研究。中国生态批评不同维度上的理论演进又共同推动着本土理论形态的逐步生成，不同维度上的话语建构也共同构成了中国生态批评的话语体系。马治军对中国生态批评发展现状进行了回顾总结，检视本研究领域的成就与不足，分析了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逻辑，评析回应了理论生成过程中的困惑和争议，为建构更为完善的中国生态批评话语体系做出了理论努力。

五是生态智慧的德育研究。该领域主要探讨的话题是传统生态智慧融入高校生态道德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属于教育学领域。阿伦·奈斯也非常重视培养深层生态意识。阿伦·奈斯所倡导的深生态意识培养路径主要有加强生态教育、个人亲近自然的直接行动、社会与政治领域的行动三个方面。国内学者也开始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如刘成波从生态价值观、生态道德理念和生态道德规范三方面构建高校生态道德教育内容体系。孟露以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为理论依据，从生态文明观、价值观、伦理观等方面论述了大学生生态教育。李晓蕾认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要从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内容等要素入手等。该领域研究者几乎一致认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要融入生态道德教育内容，并且从课堂教学、实践养成、环境熏陶、榜样示范、制度保障等教学环节方面探讨生态智慧德育方案的实施。

四、研究设计

（一）研究区选择

本研究主要以武陵山片区为重点考察对象。武陵山片区包括渝、

马治军. 道在途中——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生成[D]. 苏州大学, 2012: 6.

刘成波. 论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生态道德教育[J]. 生态经济, 2008(2): 78-81.

孟露.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生态观研究[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2012(8): 76-78.

李晓蕾.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生态系统建设研究[J]. 教育评论, 2012(4): 36-39.